

经济文摘

Digest

什么是城市活力的来源

北京的人口压力又成话题焦点

所有试图限制外来人口进入自己城市的政策,其实并不是完全限制所有人口流入,而仅限制所谓“低素质人口”的流入。个别政府官员及支持政府这种歧视性人口政策的人,也理直气壮地谈论,城市完全有权利采取所能设想的一切手段,比如,人口准入,提高生活成本,以此把低素质人口挡在本城之外。即使他们已经进来,也要让他们没有立足之地——口气如此冷酷,仿佛他们在谈论如何处理某种害虫似的。

“高素质”充满现实主义色彩,那么,这些人士心目中所谓“高素质”是指什么呢?似乎并没有人给出统一的标准,但从政府

前几天,报纸上有社会新闻:“人死了户口还在‘农转非’。”说一个人已丧生车祸,其家人还把他的户口办成了“非农”。据查,这是为了多得赔偿金。能够多得多少呢?大约10万元。

数字是这样算的,该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023元,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890元,赔偿期20年,城镇居民的车祸赔偿金最高16万余元,农村居民不足6万元。这就是车祸死亡中的城乡价格,两者的差距成为两种身份的差价。

新闻报道当然毫不迟疑地表达了对“人死还在农转非”的批评,引用的专家意见明确认为“管理上要把好关”。我想人死了户口还在农转非,自然是不合规程,然而这种现象的出现难道只配让人呼吁一下“加强管理”吗?

我们有“农与非农”两种户口,但这种两分法已经引起关于人身公平问题的巨大质疑。当然,根据一些辩解的观点,要实现

的相关政策及人大代表及民众的议论来看,所谓高素质,无非就是指高学历,起码本科,博士最好,比如,政府的“绿卡”、“蓝印户口”之类的人城特许,就只给高学历人士。当然,拥有资本,也可以算高素质。

除此之外,即使你有所特长,不是硕士、博士,似乎也不算高素质。比如,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城市给诗人、作家、画家发绿卡。再比如,慈善家、社会活动者,在政府眼里,似乎也不算高素质,尽管他们的公民精神比所有人都强烈。可见,所谓的高素质,其实是一个狭隘、充满了冷酷的现实主义色彩的概念。

社会越大越能自治

说功利主义或者现实主义,其实也没

有什么,一个人希望自己所在的城市变得富裕、繁荣而又整洁、安宁,这是很合理的愿望。但是,一个由纯粹的高素质人口组成的城市,就可以成为一个那些捍卫高素质者特权的人士所向往的理想国度吗?

人们会本能地回答说,是的。确实,至少在古典时代,甚至连最伟大的哲学家都是这样想的:老子也鼓吹“小国寡民”。有人批评这是农业社会封闭状态下的理想,其实这是古典政治学家的普遍想法。比如,关于政体,人们普遍相信,一个同时实现繁荣与自由的共和国,只能是小国寡民。直到18世纪,大多数欧洲学者都相信,治理大国,惟一合适的政体,就是君主专制。

然而,美国的宪法之父麦迪逊却颠覆

了这个说法。他说,“倘若社会在一个实际范围内,它越大,就越能充分实行自治。”麦迪逊还说,在一个国家内,出现利益、阶层的分化和冲突,其实也是一件好事。麦迪逊之所以这样说,是因为他看到了,权力只能用另外的权力来约束。一个社会越庞大,群体越多样化,权利、权力越繁多,越容易依靠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制约,而保持国家、社会总体的稳定。

阶层越细密城市越稳定

把这个观念的逻辑应用到一个城市的治理,可以说,一个城市本身分为不同的群体、阶层,具有不同的素质和亚文化,恰恰可以维持一个城市内部的平衡,使得一个城市

不可能被某个群体的偏见所控制。也就是说,一个城市越庞大,其内部的阶层、群体、利益分化越细密,这个城市的社会结构就越稳定。

大约同一时期产生于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则能够证明,如此多样化的城市,最有益于财富的创造。亚当·斯密论证了经济进步的动力,乃是分工的深化和细化,乃在于具有不同的经验、知识、智慧、技能的人,分享彼此的经验、知识、智慧和技能,从而使每个人的福利都有所增加,造就一个繁荣的城市。从理论上说,一个城市,完全由所谓的低素质人口构成,只能悲惨地沦落下去;但完全由所谓高素质的构成,同样会沦落下去,尽管可能很优雅。有好几个朝代,到最后,皇家连儿子都生不出来了。(文/秋风)

个不合理的基础之上。正如我理解古人反对皇帝乱封爵位,但更反对现代社会里搞一个贵族等级制度。

“人死了还有农转非”是不正之风,但也未必不是对歧视性赔偿的特殊控诉。真人的悲哀在于,户口不仅管住了生,而且管得了死。

就在《蒙特利尔公约》在中国生效的这一天,报纸上又报道了一例车祸赔偿的户口争议。一名刚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农村青年在车祸中丧生。根据户口政策,这名学生晚几天就会被转为城市户口,那样她的赔偿额将是16万元,她的死亡价差是10万元之多。“程序正义”当然主张严格按照她死时的户口属性来办理赔偿事宜,但想想这样一种荒唐的價格落差,难道你会相信“程序正义”就一定达到了公正的结果?如果程序内所灌注的法律并不公正,那么正义的程序将只会让人悲苦无告。(文/刘洪波)

节约能源不如“节约”权力

《华盛顿邮报》的一篇文章说:中国成全球电力浪费大户,城市形象工程浪费严重。例如上海市,政府一方面以节约能源的名义下令工厂停工,另一方面规定,摩天大楼必须保持灯火通明,以此来向人展示中国闪亮的现代化形象。尽管政府支付这个额外开支的1/3,但地产商仍叫苦不迭,声称他们“别无选择”。

就事论事地看,要想让这些地产商有“选择”地厉行节约,就必须控制地方政府无处不可选择地“强令”和摊派的权力。联想到成为“国际大都市”而不顾财力盲目建造出的摩天大楼、超大型广场等,很容易发现:资源、能源浪费与政府权力滥用之间竟有着如此紧密的内在联系。故,在大力提倡节约能源的同时,也应提倡并实施“节约”地方政府的权力。

近期广为讨论的歧视小排量汽车问题,与上述问题属同一性质:作为出租车经营者,当然知道用多大排量的车最合理、最“经济”,按说也有自由选择的权力。然而地方政府考虑的首先是“城市形象”,于是随便动用自己所掌管的制定公共政策的权力予以限制。问题在于,无论是强令摩天大楼灯火通明,还是歧视小排量汽车,究竟是哪一条法律或中央政令赋予其的这么大权力。

在企业生产或市民家庭生活中,资源、能源的浪费现象肯定也是难免的,但由于“经济理性”的约束,其浪费也许并不严重,通过价格杠杆或别的经济杠杆,就可能收到效果。倒是许多地方政府在围绕政策追求、“形象工程”冲动下而制造的资源、能源浪费,既缺乏基本的“经济理性”约束,又严重缺乏权力的约束,故成为最大的障碍。

直率地说,在现今政治体制、政府体制背景之下,要想让所有地方政府以及官员的价值取向均回归公正与理性,谈何容易!然而,节约资源、能源却是迫在眉睫的大事。“立竿见影”的办法或许只有一个:在对地方政府现有的成文、不成文的各种权力进行甄别的基础上,下决心限制其与资源、能源浪费有着直接联系的权力。也就是说,一旦滥用权力需要付出事先可感知的巨大“成本”,政府官员为了避免投诉、抵制、追究等等的另一种“形象”损失,便只好放弃对追求形象工程的强烈冲动。

节约资源、能源不仅已成共识,而且已成政府的重要理念,关键是如何“执行”的问题。假如地方政府在浪费资源、能源方面的权力得不到制约,中央政府的这种理念也许只能停留在“软约束”,其实是无法约束的状态。(文/刘以宾)

“超女”玩转了什么经济

近年来,电视传媒业飞速发展,一档能够造成某种社会影响力的电视节目不算少,但兼有巨大社会、经济影响力的电视节目却很鲜见,眼下炙手可热的“超级女声”算是一个。有人要研究“超女”的创新经济模式,看能否将其推而广之。

那么,“超级女声”玩转了什么样的经济?比如,话题经济。眼下,“超级女声”不单纯是一场乐坛选秀,而是时尚生活的一部分,甚至,成为午餐中的调剂话题,变身商业谈判的“润滑剂”。如此吸引眼球的话题,其广告时段的身价自然不菲。据说“超级女声”全国总决赛的广告报价已达到了15秒11.2万元。

还有短信经济。“超女”迷要给支持的选手投票,首先要花1元钱定制短信,收到后回复才能投票,每投一票需要0.1元。据测算,一场比赛下来,单是电视台的短信收入就达100万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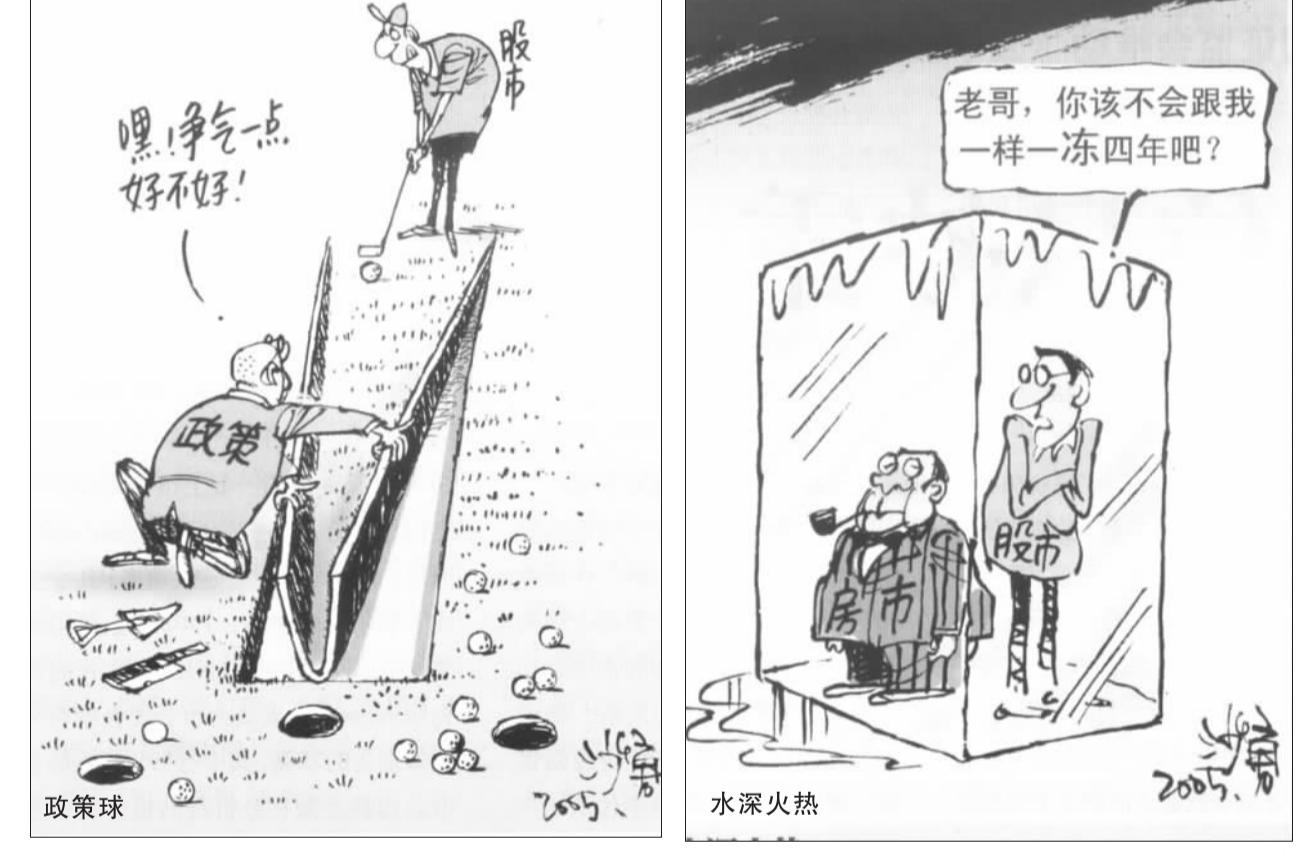
品牌延伸经济。主办方已经为“超级女声”进行了相关的商标注册,将尝试用于推出艺人等相关产业的开发上。据报道,去年的“超女”总冠军从代言、演出、出唱片等活动获得的年收入可达七八百万元。

当然,还不可忽视其对社会其他产业的拉动作用。电信业短信、网站彩铃、爆满的KTV等等就不必说了,单是靠销售印有“超女”偶像头像的T恤,四川大学学生张航一个暑假就成了万元户。

林总总结,总之,经济链条够复杂,利润也够惊人。但是,拥有复杂过程和惊人利润的“超级女声”经济模式是否一定够先进,是否一定就是创新?追根溯源,“超级女声”不过是诸如“美国偶像”等西方一些娱乐节目的中国翻版,其“话题经济”、“短信经济”、“网络经济”等,也不过是这几年娱乐界流行的盈利模式。它是在恰当的时候,以恰当的方式,玩转了一场“模仿经济”而已。

但是,仅仅靠模仿,“超级女声”品牌是无法在“真刀真枪”对打的唱片业上开辟出自己的市场来的。日本音乐人小室哲哉在接受采访时说过,好的唱片,重要的不在歌手,而在歌曲的创作。有了“超级女声”,没有“超级音乐创作人”,品牌又能“横行”多久?

模仿,是现今电视娱乐节目的一个通病。电视频道一年多过一年,但各个频道的面孔并没有太大的区别,不过是不同的主人与嘉宾人群,站在相似的舞台上,做着相同的游戏。而在以前,由于技术的局限,上海人看不到山东台,而现在卫星频道相互“串门”,看过了“美国偶像”,“超级女声”还能有多少新鲜?一向领社会风骚之先的传媒也深陷“模仿”泥潭,这实在没什么值得喜悦的。(文/郝洪)



图/沙勇 摘自《理财杂志》

■ 精品书屋

一部国企活教材

2003年的那个春天,多灾多难,SARS就像恶魔一样,让每一位中国人毛骨悚然。

在这个春天里,在大盘国企长虹人的眼里,一个叫徐明天的人跟SARS一样不受欢迎,徐明天不是什么法师,也不是什么瘟疫的传播者,只是当了一回皇帝的新装》里面那个小孩子一样的老实人,站出来指着巨人长虹说:“嘿,你遭遇诈骗了。”

徐明天是记者,可能是记者的本能使他当了那个说实话的小孩。长虹很生气,也很不理智,嚷嚷半天要跟徐明天打官司,说是造谣生事,让长虹的股票跌了不少,对股民造成了伤害。徐明天在那个春天很郁闷,长虹3000万的索赔,当时把徐的东家赔个昏天暗地,也许这个说法有点夸张,实际上长虹的做法比较夸张。

长虹与季龙粉作了N年生意,姓季的从一个小混混成为在美国商界跟沃尔玛叫板的大腕,长虹功莫大焉。几年下来,季龙粉将长虹几十亿元的人民币占用了,基本没有能力还,长虹多次派人要钱,不但没有收回,反而占用的越来越多。本人没有做过生意,但是像这样做生意的思路还真少见。季龙粉的行为与诈骗有什么两样呢?当时长虹

激动,可是交易所不干了,站出来指着长虹:“这个钱你们收不回来,赶紧处理吧。”

处理结果一目了然:老倪下课休息,赵勇掌舵长虹。换了人,市场一片欢呼。可悲的激动!季龙粉的大部分欠款被长虹以计提了之,谁来为我们可怜的股民负责,是不是我们的股民可以起诉长虹,要求长虹赔个倾家荡产?徐明天与长虹的恩怨和解,长虹现在身上有了块遮羞布,但长虹那病人脊髓的顽症依然藏匿其身。读罢《长虹隐痛》,徐明天从无意中与长虹结怨,到最后和解,潜心研究长虹的病因,让我们看到一个大盘国企的症候,也让我们看到类似长虹大盘的通病。

成也萧何,败也萧何。长虹曾经的辉煌,老倪功不可没,长虹如今的衰败,老倪不能说没有责任。老倪铁腕治理长虹,曾经为国内其他企业学习的好榜样,当一个功臣的功劳登峰造极,就很难看到其他竞争者的行动,甚至作为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决定。

老倪心中到底是怎样的?很遗憾,《长虹隐痛》没有给出一个答案。不过,现在在中国,有一大把类倪润峰,曾经辛辛苦苦将一个小小厂搞大,几十年后发现曾经没有自己



能力的人,自己办公司,虽然不大,也有上千万的身价。而自己退休后还得辛辛苦苦只能领取退休金。长虹的隐痛,到底隐在何处?曾经有一个国企的老总说过一句老实话:“现在企业大了,效益好了不能MBO,一MBO的话,别人就说在私吞国有资产,要想MBO,就一定要让国企变烂。”

长虹的隐痛是不是与季龙粉的生意有关呢?老倪壮心不已,可惜还是没有实现MBO的心愿。赵勇接力,他将拿什么让长虹大象跳舞?仅仅把以前的脓肉割掉?病人脊髓的人需要的是脱胎换骨,市场给长虹脱胎换骨的机会吗?

长虹事已如此,还能对长虹说什么呢?《长虹隐痛》让我从一个侧面看到了长虹衰败的原因。长虹是一部国企活教材,先驱的遗训留给今世同仁,一定要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。(文/李德林)

本版文章摘自:《新京报》、《瞭望东方周刊》、《理财》、《新闻周刊》、《中国企业家》、《华东新闻》、《中国经济时报》等